

我们很饥渴，我们很惆怅

2014年11月26日，陈佩斯现身水立方。这一次他不是走穴表演，而是宣布自2014年6月启动的“京禧原创喜剧剧本征集”活动结果：80部参赛作品，仅评出一个三等奖，一、二等奖都空缺。

唯一的三等奖给了剧本《闹洞房》，作者是一名“70后”女编剧。剧本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要结婚，可是没钱买新房，只能借用别人的房子，由此引出无数可能性。

是陈佩斯太挑剔吗？是，又不是。

半年征集，一共收到67个完整剧本和十几个故事梗概。陈佩斯只挑出了三个感觉不错的，其中较好的便是《闹洞房》。“另外两部作品，其中一个题材太陈旧，脱离了时代，像十年前写的；另一个借鉴了一部国外经典喜剧剧本，这虽然是个好想法，但作者显然没有强大的能力把它完成。”

于是，陈佩斯感慨：出十万元寻觅一部好剧本，竟也这么难！

说起陈佩斯，观众对他的印象，恐怕还停留在春晚。1998年，陈佩斯梳着马辫，涂着红彤彤的脸蛋，憨傻地拉着王大爷朱时茂，在舞台上一遍遍地遛圈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竟是在春晚舞台上最后的身影。

这十几年，陈佩斯专心做话剧。还是光头、布鞋，还是一脸憨笑，往那一站，便是笑声。

陈佩斯从演员变成了导演、编剧。当年的豪情壮志言犹在耳，喜剧剧本创作却遭遇了最大的难题。“现在的人都浮躁，坐下来写剧本变得很困难。每年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万，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，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。”

陈佩斯玩的喜剧相对小众，但这些年来，从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，到湖南卫视的热门综艺节目《我们都爱笑》，喜剧出了不少，但能让我们笑出来的又有多少？

陶宗震：
纠结一生的
功臣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2015年1月7日，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老人陶宗震，带着毕生的光荣走了，享年87岁。而让他牵挂一生的“梁陈方案”之争，似乎也有了终结。

陶宗震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自豪，一是在1958年国庆工程时，他负责天安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选用方案及初步设计；第二便是他师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。

或许人们会问，在那个时代，为什么负责设计天安门广场的不是梁思成，而是他的学生？这或许要从争议半个多世纪的“梁陈方案”说起。

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，陶宗震正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习，修习老师梁思成讲授的五门建筑课。那时，梁思成已经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，在英国建筑界享有盛誉的陈占祥出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，与梁思成合作北京“新市区”规划。

两人联手后不久，便推出了他们具有前瞻性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——《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初步建议》，即“梁陈方案”。方案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，将北京变为“双城”，把钓鱼台、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。

这一方案在60多年前可说颇为超前，梁陈两人甚至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城市拥堵、新旧城保护与发展预留了空间。陶宗震也参与起草了这份方案。

不过，与“梁陈方案”竞争的是来自苏联专家的方案。为了打造东方“布尔什维克”首都，苏联专家建议了今天可供人民游行以备检阅的天安门广场，沿长安街的行政机构。为此，北京古城需要拆迁改造，甚至需要拆毁故宫，此举后来被周恩来总理制止。

那个年代，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专家是政治任务，最终苏联专家的意见占了上风。

1958年，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及“梁陈方案”起草者之一的陶宗震，在两种设计理念之间做出了自己的“抉择”：他在苏联专家建议以及高层直接过问的基础上，着手设计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陶宗震成为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功臣，而他的老师梁思成却仍在为“梁陈方案”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据理力争，直至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中。

或许是纠结于当初有悖于老师理想的选择，陶宗震在成为功臣之后的大部分人生中，都在为老师梁思成“正名”。在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大会上，陶宗震再次重复其“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”的观点，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者、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的。

另一方面，陶宗震也希望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作一些辩解。在2014年5月的一份《中国建筑报》上，陶宗震曾撰文批驳为“梁陈方案”叫好的声音：“1983年元月，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同志与我谈到北京的规划建设时，转述一位领导同志的话：‘悔不听当年梁先生新北京的意见。现在把北京搞乱了。’对此我感到很惊异，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。”

陶宗震认为，从完整保留下来的“梁陈方案”原件判断，其庞大的占址规模，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，即使今日北京人口已超过千万人，仍然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中央机关行政中心建筑群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在北京日益拥堵的车流久治不愈，以及旧城保护与国际化新城开发这一绝对矛盾爆发多年后，梁思成的另一位学生吴良镛与弟子吴唯佳，参照“梁陈方案”的规划理念，设计了今天广为人知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，将部分行政功能迁出首都北京，这一方案已获多方认可。

或许真理只有时间可以验证。

“巧妇”陈佩斯难为无米之炊

喜剧，沉重的石头

第四届北京喜剧艺术节筹备一年，没逗乐观众，还弄得发起人陈佩斯愁眉苦脸。他原打算充一回土豪，拿着大把的银子广征优秀喜剧剧本。结果，征来80个，只评出一个三等奖。2014年12月喜剧艺术节展演，只演了三部。

难道真如柏杨所说，中国人不会笑了吗？可你往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的剧场里看，所有人不都笑得前仰后合吗？问题是，那些制造笑料的人哪儿去了？

本报记者 贾凌煜



我们都爱笑，只是缺少笑的突破口

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喜剧故事。一个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跟一头驴在一起。驴老咳嗽，他想给驴喂药水，但是驴一再吐出来。于是，卓别林想到了用管子给它吹进去。没想到在吹的同时，驴突然咳嗽，结果药水全到了卓别林的肚子里。另一个故事与这个如出一辙，是讲给大象喂药面，结果弄了自己一脸，因为大象先吹了口气。

这两个故事一直在表演艺术家姜昆的脑海里。“中国喜剧市场非常大，但现在被一些质量不高的内容充斥着，这应该改变。这两个故事虽然简单，却有巨大的‘笑果’，这就足够了。”

姜昆与导演兼主持人刘仪伟住同一栋楼。有一天下楼时，姜昆碰到了刘仪伟。被问及是否看过《泰囧》时，姜昆谈了自己的三点想法。“当时我说，第一，它太成功了，能把李安的电影挤出中国；第二，太另类了，相声包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，但这个电影都在意料之外，没有情理之中；第三，中国的喜剧观众规模还没有形成。”

喜剧观众未成规模，印证了我们都爱笑，只是缺少笑的突破口，这正是编剧们最头疼的问题。

“让人哭容易，可让人发自内心地笑，太难。”《泰囧》编剧束焕说。现在观众对有规律的东西已经非常熟悉，只有当剧中情景形成一种社会心态的东西后，才会引起观众的笑声。

喜剧是聪明人下笨功夫

当年重返话剧舞台时，陈佩斯曾说过：“当你抖了一个包袱，观众笑了，你满足了。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过来时，你再把新一轮包袱扔出去，它再回来……这事太享受了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，比喜剧更能带给演员那么多快乐。”

如今，潜心创作的舞台喜剧《托儿》和《阳台》成功上演，让陈佩斯更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。

然而，越是坚守，陈佩斯越是忧心。这不仅源于喜剧创作荒，也源自人才荒。

在我国，专业艺术院校开设音乐表演、戏曲表演、影视表演，唯独没有喜剧表演，更没有喜剧院系。喜剧教育的缺失，使得喜剧艺术长期存在发展瓶颈。

正因为此，陈佩斯一直活跃在喜剧教育一线。理论课上，陈佩斯以严肃著称，动辄讲到上下五千年；实践课上，他则常常现身说戏，不论是农民工、处长、悍妇还是小三儿，各种角色都是信手拈来。

对角色的理解靠的就是演员的悟性，只有根据剧本结构，在舞台上带着观众玩进玩出，才算成功。有悟性的演员，对于喜剧剧本创作也有独特的理解，比如陈佩斯。

“对《阳台》的剧本，我不知道发呆了多长时间，呆到自己都快傻了。喜剧剧本的创作，完全就是自己折磨自己，自己跟自己对抗。一个剧本结束后，又得一切重来。”陈佩斯不是科班出身，同样不是科班出身的编剧还有四成多，他们依旧走在写剧本的道路上。每次写一部剧本都是翻一座山，如果看着山发憷，最好的办法是撤退。但是只要做了，就有自己的所得，这条路走了，就有收获。

席勒说过，当人游戏的时候完整，当人完整的时候游戏。其实，喜剧就是聪明人下笨功夫。演员也好，编剧也罢，莫不是如此。